

丁 邓
一 拓
岚 同
同 志
志 藏
捐 书
赠 简
的 介

薛
英

一九七九年九月，丁一岚同志将邓拓同志长期珍藏的部份书三十六种一百二十九册，捐赠北京图书馆。

这部份书籍从印刷的方式区分，有刻本、铅印本、钞本，也有影印本。从版本角度看，有比较早期的刻本，如：宋姚铉编纂明刻的《唐文粹》，就是历来为人们所重视的一种。又如：《范文正公别集》四卷本，刊刻精致，字体纸张独具特点，其质量类似宋刻。此外，还有一些晚近的印本，其中有的是资料价值较高的书籍，如《古巴华工调查清册》记载了古巴华工们的血泪控诉

和他们所遭受的种种残酷压榨及非人的生活状况。十四册佛经是有名的福建东禅寺或开元寺所刊，即我们通常说的福州藏（也可能还有几册普宁藏）。虽已蠹食，但字迹未损处，笔锋遒劲，可见当时刻工技巧之纯熟，可以代表福建刻经的风格。除此以外，邓拓同志还搜集了一些清人书札，其中比较重要的有：李鸿章、祁家父子（祁韵士，祁寯藻，祁宿藻）、祁埏、洪钧、盛宣怀等人的来往信件。这些信件从不同的角度反映了当时的一些政治历史情况，而这些情况在所谓的正史中往往是不会记载的，这些信件为我们提供了第一手材料。下面略加介绍。

祁家父子的十余封信，主要是祁宿藻写给他五兄的信，另两封信是祁韵士给他儿子寀藻、寯藻的，还有祁寯藻在道光十八年闰四月十五日为他弟弟祁宿藻会试得中第一百三十二名贡士的谢恩摺。另一个摺子是道光二十五年五月二十五日，祁宿藻授翰林院

检讨后的谢恩摺。

祁韵士字鹤皋，山西寿阳人，乾隆四十三年戊戌科二甲四十七名进士，《清史稿》卷490有传，入文苑。他在嘉庆初年曾经以郎中銜监督宝泉局，后来因为揭出了局库的亏铜案，被戍往新疆伊犁，但不久又被赦回，最后卒于保定书院，年六十五。邓拓同志收集的两封信是祁韵士从伊犁回来后写给他儿子案藻、騫藻的，内容是教育儿孙们要寒窗苦读，争取功名的一些“庭训”。可以看出封建官僚教子成名的心情是多么急切和挖空心机。而祁騫藻后来确实也爬上了高位：任体仁阁大学士，官居“当朝一品”的“首揆”，人称“寿阳相国”。但实际上也不过是一个“有学无识”的封建官僚而已。

他的另一个儿子祁宿藻字初章，一字子孺，道光十八年三甲七十八名进士，他活动正逢太平天国起义军的烽火遍燃东南各省的时候。开始他在广东作官，以后又转到湖南，最后到江西，太平天国攻占九江后，为清王朝殉葬于九江城头。这里的几封信是他在广东时写的，全是谈的所谓“贼情”，以及他自己的一些看法，真可以说是惶惶不可终日，而在另一方面则反映了当时农民起义军的强大攻势。下面我们来摘录他在升迁湖南布政使后写给他五兄的信，以见一斑。信中说：

……遽荷殊荣，俯仰多惭，难以言罄，惟有竭力尽心，勉益加勉，留营办事，尽瘁不辞而已。第思此次贼匪竟系强敌，初次王署协掩捕不过六七百人，被贼人诡计陷辱，而兵皆散逃，战死者祇捕役数人。至弟与提督驻扎清远，贼已窜入佛冈，相距一百七十里。史守督兵前往，因乡民之哄而仓猝出兵又为贼陷，此中曲折一言难尽。总之责人不可过苛，责己不可过恕，弟惟引咎自责

而已。大宪谅弟愚忱，未加参劾，而贼却用计，我即堕贼之计。三令五申，而临时不听节制，则无可如何而已。抚宪以提军病剧，弟之权轻任重，恐难得手，故尔亲临督办。所募壮勇，乃系东莞乡民，最为奋勇，而十九日之战虽已打胜仗，即可扎住，乃一往无前，竟遭穷寇之反噬，突出不意，带勇之首领被贼从旁戕害，以故壮勇纷纷溃回，功败于垂成，真可惜也。弟之遭遇无不艰难险阻，去岁超迁臬司，心即惴惴，恐遇兵事，而尚未知遇如此棘手之军务也。现受重恩，即不奉廷寄留营，亦拟自请留办，惟贼众已聚至四五百人，谋有诡计，战有凶徒，我兵一击不中即畏贼如虎，现虽抚军来营，而此事年前能了即属万幸。五旬以来，天旱不雨，河路乾涸，处处可涉，兵勇云集，粮饷浩繁，现已费至七万余金而尚无头绪。广州股匪又剿一次，一日七战，尚未败挫，亦可知此地之事难得手也。弟之身子尚好，然夜间常不能寐，凡事健忘，真知才力之不及而不敢为自谋之计，惟有尽瘁鞠躬，以盼军务早结，然后再作还山计耳。且迩来心急如火，眼目大花，须鬓之白，已至太半，心神恍惚，夜不能眠……

这封信的最后，祁宿藻说：“弟之苦衷，万言难罄，不知何时能晤兄面，为之抱头一哭也”。信写完以后，他又附上了一笔，短短的几句话，却有“点睛”之妙，充分地表现了内心之不安与惶恐。他说：“弟此番升官，不知喜在何处，故不敢为兄贺”。这样，在太平军的打击之下，他死在江西，也就是意料中事了。

祁 埏 的 两 封 信

祁埏字竹轩，山西高平人，嘉庆元年三甲二名进士，曾官至刑部尚书，加太子太保。道光二十年（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后，他于次年广东，给耆善“治饷”，道光二十四年卒。（清史稿卷337，列传158，有传）这两封信中都谈到了修炮台的问题。其中一信说：“大炮亦仅是内河之用，日来与元戎筹商，即将赶筑虎门各台（共计十处）并将省河之炮分一半与安于虎门。逆计逆夷闻筑虎门炮台，必将入而滋扰阻挠，背城一举，势不能已，但未知胜负如何耳。”在另一封信中，除了谈到虎门及制造大船的困难情况外，还从另一角度谈到了“内忧”问题。他在信中说：“以刻下夷情而论，战守和三字皆有难行，然竟无出路能乎？外患未息，而内忧更为可虑，江南之水手、盐梟，河南、山东之拽刀手，直隶之通州扛夫，澹州之资匪，均似应早为设法防范。”以下他又谈到了鸦片战争和议的一些情况，以及由此而可能造成的被动局面，话谈得也还是深刻的：“夷务至于此极，令人愤懑，无以为生，闻伊耆二公已议息事，其如何定议，尚未得其详。若能暂靖干戈，但存体制极好，所恐诸多受其挟制耳。粤东现虽无事，然燕雀处堂，岂是长策？且逆夷既得手息事，此后有挟而求，拒之则生隙，从之则失体，如何，如何！”

洪 钧 的 八 封 信

洪钧字文卿，吴县人，清同治七年一甲一名状元，官至兵部左侍郎。曾出使俄、德、奥、比四国大臣。光绪十九年卒。曾朴

写的《孽海花》中的一名男主角，就是以他为原型的。邓拓同志收集到的八封信，都是他出国以后写给艺芳的。洪的信札不多见，这八封信主要是谈所谓“洋务”的，大致谈到了以下几种情况：

1. 关于出国随行人员如何安置问题；

2. 求访一上等（即技术比
较高明的）矿师不可得；

3. 关于购买铁椿、铁舰、发电机、测远机的情况及财务问题；

4. 反映克鲁卜（按今译
克虏伯）工厂当时罢工的一些情况。信中说：“……前月所有各厂工人尽行罢工，要挟加价，克鲁卜厂至电购英之煤，始不至闭厂……”等等。

5. 谈到关于聘请外国技术人员的一些问题。

洪钧的信札，为我们研究晚清的“洋务”政策提供了第一手材料。

邓拓同志离开我们已经十几年了，他给我们留下了许多宝贵的精神财富，他的严谨的治学态度，给我们作出了良好的示范。现在，我们收到的邓拓同志的这部分藏书，可以想像它是经过了不平常的遭遇的，这也是值得我们珍视的。

一九七九年十月